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

流散文学： 本土与海外

LIU SAN WEN XUE
BEN TU YU HAI WAI

钱超英 著

海天出版社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

流散文学： 本土与海外

LIU SAN WEN XUE
BEN TU YU HAI WAI

钱超英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 / 钱超英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7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

ISBN 978-7-80747-032-8

I. 流… II. 钱… III. 华人—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6450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蒋鸿雁 责任校对：刘宗明
责任技编：钟愉琼 装帧设计：海天龙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9.125

字数：150千字

总定价：225.00元(共9册)

本册定价：1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文艺评论求创新

胡经之

文艺评论乃应文艺创作的发展需要而产生，但一旦产生，反过来也可以对文艺创作起促进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必不可少。

深圳在成为特区之前，虽然只是一个两万多人口的边陲小镇，但早已受岭南文化传统的哺育，有着自己的文学艺术。我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初来深圳，就已见识到东门老街上的电影院、粤剧团和新华书店，也感受到深圳本土古朴民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大量移民的涌入，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促使深圳的文化艺术进入新时代。1984年深圳开始有了长篇小说，也首次出现了画展，《特区文学》杂志也诞生了。但文艺评论滞后于文艺创作，好几年后，《深圳特区报》开辟文艺副刊，文艺评论才有了发表的机会，但一时也很难活跃起来。

在特区成立的最初十年，文艺创作发展较快，但文艺评论发展较慢。深圳不仅有了专业作家，而且业余作家不断涌现。文艺评论却没有专业人士，只有业余爱好者，也为数不多。从粤北闯入深圳的青年作家刘西鸿发表了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引起国内文坛的关注，1986年在广州为她召开作品研讨会，出席的大多为广州的评论家，听不到深圳的评论之声。要在好几年后，才逐渐有深圳自己的评论爱好者，在深圳参与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研讨会。

等到跨入九十年代之后，深圳开始反思文艺十年的得失，逐渐意识到文艺评论对于文艺创作发展具有巨大作用，迫切需要文艺评论。若要培育既具有时代精神又有深圳特色的文艺精品，就必须发展文艺评论。于是，好几个报刊上陆续开辟了“文艺评论”、“文化广场”的专版或专栏，为文艺评论提供了阵地，文艺评论逐渐活跃起来。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深圳自己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名叫《文艺评论选：1980—1992》。接着，在1994年，文联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深圳文艺发展理论研讨会”，深圳本地和外地的文艺评论家共聚一堂，为深圳的文学艺术发展献计献策。在论文集《春华秋实》一书中，不仅对深圳今后文艺发展的未来作了展望，而且对文艺评论的作用作了进一步阐发。

深圳是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突然急增数百万，文化底蕴不足，历史积淀不深。怎样在这张纸上画出更好更美的画来，这需要理论的思考，深圳比别的地方更需要文艺评论来对复杂的文艺现象进行探索，引导文艺的发展方向。为了推动文艺评论的进一步发展，文联在1995年11月促成了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建立。在深圳从事文艺评论的多为业余作者，分散在各个文化、教育岗位，有的在深圳教书，有的从事其他文化工作，有的在报刊当编辑、记者，并不以文艺评论为专业，互不通气。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使分散于各处、蕴藏于民间的评论爱好者得以互通信息，进行交流，并推动了大家和作家、艺术家的沟通。目前，文艺评论家协会已有会员88人，所撰文艺评论著作（文学、美术、音乐、影视等类）已超过100余种，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著书立说，各显神通。

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十年来，先后对本土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如《花季·雨季》、《家风》等优秀作品举办过研讨会50多次，协助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究会”。在跨入新世纪之前，协会先是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圈点与追问》，内容涉及深圳的文学、美术、摄影、影视等各个艺术领域。在深圳市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文艺评论家协会又主编出版了《深圳文艺二十年》，对深圳二十年来的文艺发展历程作了反思，对深圳文艺发展道路从理论上作了探讨，中心是文艺发展怎样既能围绕主旋律，又能符合多样化。文学、美术、影视、戏剧、舞蹈、书法等各个艺术协会的负责人都撰有专文，探讨涉及各个艺术领域。这种对文学艺术全面的理论探索，在深圳尚属首次。全书的序言《深圳艺术之路》在2000年的《文艺报》头版发表后，曾引起了国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使国内文艺界对深圳的文学艺术发展历程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这是深圳文艺事业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两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才能符合时代发展、文化立市的要求。俄国曾在十九世纪创造了文学艺术的高度辉煌，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相互推动，形成了共同繁荣的局面。著名诗人普希金认为：看一个地方的文学水平，只要看那个地方的文学评论所达到的水平就可以了。一个以“文化立市”为

目标的现代化城市，不仅要创作出许多具有自己特色的艺术精品，也要树立起自己的理论航标。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评论的发展，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在走过第一个十年，跨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主编出版这套《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选编了深圳文艺评论工作者所写的文艺评论著作十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评论伴随文化立市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文艺批评关注深圳文艺的最新成果。

收入丛书的这十部书稿，有的专论深圳的文学艺术，有的在论及深圳文艺现象的同时，也涉猎了深圳的许多文化现象，甚至，还涉及国内其他地域和海外的文学艺术，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着对深圳文艺的关注和论说。作者都是在深圳工作而且熟悉深圳文艺的评论工作者，对深圳文艺现象，都有过思考，像李小甘，改革开放之初就来到深圳，长期从事深圳的文艺发展规划工作，熟悉深圳文艺发展历程，他的文艺评论集《三文集》，不仅反映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学、电影、电视、舞蹈、美术等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而且对文化艺术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倪鹤琴则更将深圳的文化艺术放在世界文化视野中来考察，对深圳提出“文化立市”以来的文化艺术走向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这本题名《文化致远》的专著，颇具学术的独创性。李华的《不甘悬置》把笔力集中于深圳文学艺术，作出了富有特色的探索和批评，不仅勾画出深圳文艺的发展历程，而且洋溢着浓郁的“深圳情结”，进而探讨深圳文艺评论本身的“本土性”。其他几位作者，侯军、钱超英、周思明、刘子建、黄永健、安裴智等，也都分别对文学、美术、影视、戏剧等作了重点探讨，各有所长，自成特色。这些文艺评论，大都是面向文艺创作而作，编委会鼓励文艺评论本身的多样化，希望有人能对深圳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创作经历也能作些研究和探讨。研究美学的陈吉庆对一位评论工作者的美学生涯感到兴趣，写出了一本专著。这是推广本土艺术家、特别是老一辈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一次有益尝试，编委会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开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类似的本土文艺家专论著作的出现，文艺评论也要自主创新，逐渐多样化。

文学艺术的根本使命就在于遵循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高扬真、善、

美，鞭鞑假、恶、丑，“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文艺评论就是要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和统一起来，对文艺创作进行美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推动文学艺术向先进文化方向发展。十多年来，文艺评论曾对移民文学、打工文学、青春写作、都市文化、大众文化、都市山水画等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跨入新世纪以来，在“文化立市”的推动下，深圳的文化蓬勃发展，更趋向于多元化，形成深圳文化的新格局：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主流文化，正在稳健地往前推进；高雅文化的普及，正在加大力度，渐成气候；大众文化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正在渐具深圳特色。文学艺术，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文化新格局中亦在发生着变化。由于日常生活正在日益向审美化发展，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差别正在缩小，那么，文学艺术还能起什么作用，还需要发展吗？又由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电影、电视、电脑的技术不断创新，已在和新的文学艺术相融合，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形失色，过去主要依靠文学语言为手段的文学艺术将走向何方？再由于消费时代的迅速来临，文化的产业化批量生产，创意产业、体验经济、审美文化的迅猛崛起，文学艺术也成了商品，为消费大众快速消费，那么，消费时代还要去创造艺术精品吗？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艺术生产的交换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否还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等等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文学艺术发展急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文艺评论，不能回避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深圳文艺评论在今后发展中，需要面向现实，与时俱进，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这就促使文艺评论本身要不断创新，不仅文化视野要更加广阔，了解世界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动，更要研究我们自己文艺实践中的新问题，深挖下去，抓住矛盾。这样，文艺评论必然要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紧密结合，促进高雅文化的更加普及，促使主流文化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让大众文化不时得到提升，让不同层次的文学艺术都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发展，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祝愿深圳的文艺评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2006年9月于望海书斋

谈点文学

(代前言一)

不要欺负民工和诗人

——民间谐语

据说，在当今一些外国社会上，只有两种人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同性恋者和疯子。作为玩笑，这种说法自不必当真。何况福柯和女性主义学说早已揭示，疯癫者和同性恋并不是什么的污点，而与“常态”相去不远。不过，在我们这里，对许多人来说，文学的确已经变成一种越来越遥远和奢侈的东西。正当苏联人为他们的中国式“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而激动不已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这片一度显得十分宏伟的大陆，似乎正被生活的涌流冲刷成一些漂浮的岛屿。近年来，不止一个作家在他们漫谈创作的散文随笔里宣称过、或使用了这种时髦的标题：不谈文学！

不谈文学，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写作，但不必谈论。因为文学是深深植根于人类个体的精神秘密。是一个作家灵魂的呼吸，是一个读者无言的领悟。对这个岑寂的心灵感应的世界来说，一切关于文学的议论、批评和研究的争吵只是构成了一种“噪声背景”——尽管对发出这些“噪声”的人来说，这种“噪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另一种超越具体作品的特殊的意义体系和文化价值。

然而，“不谈文学”的第二种含义，却是对文学本身的鄙薄和疏远。文学（以及其他艺术活动）的宽松和活跃，曾经是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序幕，“一唱雄鸡天下白”，文人着实忙碌了一阵子。拍案而起，抚掌称快。无论是赞美诗还是骂娘话，那些曾经只能绕着饭桌和客厅转的声音，很大一部分已经可以经过文艺的打磨，涌到传播媒介来，变成文字和画图，变成丛书，变成林林总总的文艺产品和文艺家的兴高采烈。而今，它们作为“无用的把戏”正在经受价值上的漠视。社会生活日益平面化、物质化，对生存终极意义的追问让位于对世俗需求难以厌足的攫夺与占取。由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轴心的失衡，由于在短期实用主义驱动下人的实践能量指向的巨大偏移，一度以点拨人心、指引时代而获得重要性的文学，戏剧性地变得尴尬起来。女作家张辛欣曾在一篇题为《镀金时代》的随

笔中谈起“文化的被摧残”的可能性，可说是满纸悲凉：“‘纯文学’对‘俗文学’的界定，有使命感的文学对‘玩文学’的文学的政治声讨，为文学作品捧场的文章和评论界的内战随着多种杂志一起化成纸浆。面对的现实是：铺天盖地的抢购风潮……”更有朱大可痛心疾首地指点文化的“死亡”：“人们为巨大肉欲的解放和物质的严重匮乏这两者的冲突而迷狂，因此所有形而上的沉思都被肉体痛楚打断。一个吃的动作，一个涂抹脂粉的姿势，一个观察钱币的眼神……这些日常功利的操作替代了对存在意义的辨认。中国人就因此进入了一个深刻的精神危机……”

我不知道在文人的这种呼号中有多少是出于他们特有的使命意识，有多少是属于既得利益和地位被动摇的怨愤，只知道文艺的确陷入了某种惶惑。

文学艺术与现实主流生活的分离在加大。颇有点类似西方在浪漫主义之后的情况：文学艺术已经不仅被看做对生活空缺部分的补偿，而且被看做只对那些在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丧失了“成功”机会的人才具有价值和意义。

于此可见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娇嫩性。它并不具备现实的力量对生活进程本身发生实际影响。马克思有一个思想：资本主义是与诗歌和艺术天然敌对的。虽然我们发育中的商业环境尚未完全等于真正的“资本主义”。记得上个世纪末，有个法国诗人马拉美曾喟然叹曰：“我作为诗人在世上的处境，就如活人处在坟墓之中。”然而，西方社会令人感叹的不仅是极度的商业化，令人感叹的还有这样的社会依然能不断的产生对人类精神终极价值不懈追求的艺术家的奇迹。

当代文学面临的现实处境是严峻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缺少宗教文化精神的民族来说，文学的功利性一直被看做其存在的依托。这种观念顽强赓续，尽管表现的形式时有不同。过去，这种功利性或者表现为“文以载道”，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者表现为立身立言，以猎取功名为指导；又或者表现为出世隐逸，颐养性情，作为调剂个人情趣的“精神营养”（有论者名之曰“精神实用主义”）。而今，对具体经济利益的追逐又带来文学活动大面积的鄙俗化。我们不必否定发展商品经济对一个现代

国家的极端必要性，但文学是另一种事业，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事业，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总是人类尊严和精神自由的某种象征——对一个真正献身于此道的作家来说，这种尊严和自由常常体现为宗教般诚挚、纯粹的艺术人格和创作态度。对他而言，文学的真谛如同上帝一样具有绝对而完满的意义，卓越的文学本身即是一切，而不需附带任何世俗功用（其客观上具有文化意义另当别论）。他不惜为追求文学至善至美的表现呕心沥血，而不为任何世俗浪潮和功利目的所左右。法国“新小说之父”阿兰·罗伯·格里叶最近在答复一个中国刊物《世界文学》关于“你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提问时，只说了短短几句话：“我曾是个研究农学的技师。在三十岁时，我抛弃了原有的一切，开始写作……当时，那是一个无人愿意干的差事，但是我不在乎。”美国作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提到诗人和小说家的天职在于表现人和人性的“不朽”，让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亦即属于人类尊严和精神自由的那些东西。

当年，鲁迅曾慨叹中国的一些青年作家缺乏长久坚韧的创作韧性，以出一两部作品为满足。而在另一个场合，鲁迅又曾经慨叹我们的国民性中缺乏“诚”与“爱”的精神特质。可以把这些精神特征理解为对一个价值目标近似宗教式的虔敬与执着。如果说，知识者（作家）的特点是国民性的某种反映的话，那么，鲁迅的这两种慨叹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的文学要产生深潜博大、艺术超凡的大家与大作，除了各种社会条件的配置外，超越性的艺术人格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个在世俗生活中失败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对生活作无情的审视和评判，以人类的良知对弱者寄予深切的同情，感悟到人类的痛苦和灾难；而只有一个超越于感怀身世遭际的人才有可能对历史生活的客观趋势作出坚韧的承认和强大的概括。可以相信，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在这种情理二律背反的矛盾中煎熬玉成的。生活在中国南方，生活在边城一隅，谈论“走向世界文学”之类的话题，总不免让人觉得迂阔。但是，任何杰出的作家，总是一方面紧紧拥抱此时此地的人生，一方面努力追求文学的美学高度。还是那

个福克纳,我们知道,他毕生所写的也不过就是自己“邮票般大小”的家乡。重要的是要有艺术家的洞察力和超越意识。

谈点文学。以便让我们在急喘的生活之流中,有哪怕片刻的低回盘桓,聆听历史与人性的碰撞挤轧在人心激起的回鸣。

谈点文学,不问为了什么。但总归关涉到人,首先是一些沉思的、诚挚的人,一些对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怀着永恒的屏息静气的惊奇和迷恋的人,一些保持着完整敏锐的美感能力的人,以及一切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人——真正的人。

(曾收入作者所著《文化现象》,青文书屋 1991 年版)

中国现当代人文精神的三种困境

(代前言二)

用哲学的语言说，在现代性的征途上，我们正和后现代状况蓦然相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在追求地区和民族发展的同时，我们正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和全面性的霸权相遇；用文化心理学的术语说，在追求身份确认的同时，我们正和人格多重分裂和身份杂文化、流动化、碎片化的状态相遇。

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并不是指前几年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某一种被特别呼唤的精神。无论是从过去总结出还是就未来预言出哪一种主导性的精神原则都不是我们此刻要做的事。我们毋宁是用“人文精神”泛指那种总是对人类生活做出意义省察的力量及其活动，就算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吧。在这次讨论中用这个说法，多少有些规避严格意义的“学术思潮”的意思，以便我们即使没有通观学术全局的本事，也能就当代文化问题表达一点粗略的感应。我们相信这些感应和学术思潮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可以把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困境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表述为三个关键词：

一曰断裂 (Interruption)。现当代中国人文知识者大约经常生活在一种惶惑之中，即我们很难与历史保持有力的联系。独特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抽象的意识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根基和精神源泉。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从制度到时尚，从思维到语言都被重新“编码”过了 (结果很可能是一种无法令人心安理得的“乱码”)。当代历史场景仍然在以出其不意地快速转换一再破坏我们经验的连续性。说来奇怪，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经历过那么重大的维新变法、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今日的一波波广涉各阶层的改革，那种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感觉至今仍追逐着我们。这表明我们为应付世界的持续变化从既成历史中发现的资源十分有限或竟为空白，并且这种信念 (即“过去救不了我们”的意识) 也终于使我们没有能创造出“我们的”现代历史，我们的现代史毋宁说是

外力持续冲击下传统不断断裂的过程，这在当代又进一步造成了历史的缺席。可能很少有民族像现当代中国人那样，常常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就经历好几次根本性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精神的激变。当然，可以思考的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化、实在化的当下，“我们的”历史建构是可能的吗？但是，如果不去考虑这种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可能性，又如何克服我们在当代无根性的焦虑？

二曰错置或错位、错逆 (Displacement)。近来我注意了一些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课题，发现这个词常常出现在西方那些研究难民、移民或流亡者族群的文献里，用来描述那种“为什么我们会在此时此地”的疑惑和非归属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之交）起，我国有大批知识分子前赴西方国家，不少人并且终于滞居彼邦，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就正在直接经历这种错置。我发现他们身上很多文化精神上的矛盾其实从中国当代生活的文化冲突中就开始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不少人虽然仍在中国，其精神心理已经“移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在今天，所谓一国内外之别概念已充满倒置、交错之感。不过，我们现在用这个概念提示的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百年来我国人文思潮在西方相应思潮影响下的“错位”现象。关于这一点，其实李泽厚曾在研究现代思想史时已提到过：“近现代中国在接受西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社会政治学理的同时，便也同时感受到由拜伦到尼采对历史走向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异化世界的坚决的反叛。于是，启蒙主义的理性、乐观、进化思潮与本世纪的非理性、悲观、反历史思潮相冲突而来，同在最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魂中投下了身影。近代与超近代（现代）、理性与反理性、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使心魂结构变得复杂了。”今天我们面对的现代自由经济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现代性追求与后现代主义、第三世界立场和后殖民批评等的犹豫辩难，其实无一不是此等情境倒置，意义错杂局面的延续。

三曰疏离 (Isolation)，这是指当代人文精神正在失去与其他广泛的社会进程的实质联系，而被孤立于社会文化中边缘性的、无力的境地。关于这一点，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属于社会学意义的，即由于现代

传播技术的普及，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人文活动家正在失去传统上作为知识权威的引导角色。然而我们想指出的另一个原因则属于人文思想原则自身的逻辑发展：由于当代人文精神每每以摧毁关于世界普遍解释的“宏大叙述”为时尚，事实上也就是在摧毁自己把各种具体的生活领域联结起来的根本旨趣，也摧毁自己对历史和当代生活走向的解读功能。由于在广泛的生活进程中，众多的声音强调只要求发现“具体的真理”，它们事实上就是在以一种羞羞答答的方式来推销自己的“宏大叙述”，因为它们默然宣示除了“具体的真理”之外，再无别的普遍原则的立足之地。这也是一种“霸权”，而且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霸权”。目前，它在人文精神中正在激起反抗。但是，在当代条件下，这种反抗可能只会进一步强化上述疏离状态。

对中国当代人文精神这三方面的状态描述，第一点提示的是它根源性经验的脱落，第二点表现为价值选择的冲突，第三点则着眼于它在生活进程和结构中定位的困难。这一切构成了它在很多人文研究领域“失语”之叹的缘故。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并非偶然，现实的文化格局重构困难深度受制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人文脱序、社会有机性长期流失、中国人文化身份难以定位的历史性困境。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的“流散”虽然人们较多地把这个概念用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如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海外华人的身份危机、身份焦虑的“国内”版本，它也和中國移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移民）在海外遭遇的精神困扰相互推挽，互为因果，并且可在一定程度上互为注解。当然，我们的概括并不能导致对其尴尬境况的直接改善。毋宁说，关于尴尬的意识，才是中国人文精神当代存在的一种证明。这样，人文精神在当代的意义，以及它的局限都包含在这个事实中：它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它对当代生活提供认识并发生作用的一种方式。

（原载《学术研究》1998年10月）

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

——有关拓展当代文学阐释基础的思考

(代前言三)

我昔自以为有一片乐土，
藏之记忆里最幽暗的角落，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

——何其芳《柏林》

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
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
什么关系了。

——鲁迅《在酒楼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借着如何为新兴的深圳特区的文学走向命名的议题，妄谈过一个所谓“移民文学”的概念，以此尝试论证一种“挣脱于地区局限”、“不囿于一城一地”、“旨在表现新旧交替时期人的遭际、处境、命运和情绪的文学”^①。

近年来，笔者注意到，在有关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种种译作、论著中，“族裔散居”(Diaspora，又译作“大流散”、“在外侨居”、“漂泊”等，我觉得也可译作“文化离散”)已然成为一个触目尽是的命题。

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深圳这“一城一地”的文学批评时，引用这个源自犹太史典、如今主要描述国际移民及全球化问题的术语，还能够打开多少借题发挥的通道呢？或者，它有可能提示一种理解我们的历史、人生和文学的更大的思维场域吗？

在新世纪刚刚进入首个年代一半行程的2005年，仅仅在6月至8月的两个月之间，就有两个全国性研究的大型聚会，选择了在新兴的边陲城

① 参拙文《移民城市中的文学躁动》，《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文艺评论选（1980—1991）》“深圳特区文艺丛书”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市深圳举行。一个是与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同时举办的“中国都市文学研讨会”，一个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这也是这个学会在此地成立20之后的再度重临）。这两个会议，主办方的行业建制、召集渠道和与会者的专业背景都不尽相同（一为文化～艺术创作系统，一为教育～学术研究系统），但都把“移民城市”或“移民文学”当做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这是一种偶然的集合，还是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标志？区别也许只在于，前一个会议更多地从城市品格的角度探索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移民现象造成的文化影响；而后一个会议则更多地把国与国之间的移民与世界文学的格局结合起来研究。但是，国内移民问题与国际移民问题，仅仅因为文化环境划分和专业领域划分的内外之别，而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疆界吗？

这两个大会有关移民的类似议题，使笔者想到澳大利亚作家艾力克斯·米勒在小说《祖先游戏》提出的格言：疆界是为了逾越而设置的。

空间的疆界是这样，时间的疆界也是这样。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整个现代生活的建构及其特质（或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现代性”），作为“非传统”秩序，就是从文化离散、人事流走、命运悬置开始的。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家族、土地、传统人伦等），进入一种“失根”和“漂泊”的状态，已成为无数人类个体痛切感应到的普遍处境。西方世界是这样，被西方所逼迫变革的第三世界更是这样。只不过，前者的形态可说是主导发动、系统转换或有机过渡，而后的形态则可说是根脉折断、结构破裂、甚或接近文化的分崩离析。

难道现代中国的革命叙事，不正是以人对传统家族宗亲的反叛作为起点的吗？也许，我们应该把现代文学史上大量的家族争吵、旧情新恨、出走、反叛、骚动的故事，当做文化离散的象征来解读。不然我们就很可能会低估类似巴金的《家》这种小说的历史文化意义。

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未完成的历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及伴随其而来的大幅度的思想活跃、民风激荡、世态急变、地区差异，还有数以亿计人家的流转不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延绵百年的长过程的新段落而已？

我们都知道，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也就没有其他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崛起。相较于当年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波动的几乎是一面倒的欢呼，今天，如何面对日益严酷的贫富差别、阶层壁垒、治安和环境困局，如何解决千百万“移民”的身份难题，以推动一个宽容、和谐社会

的理念，已渐渐地成为施政层面上的前台议题了。但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长期代价。在我们的社会进程中，历史和人性的冲撞撕裂，比之现代性的原发社会要严重百倍。时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些代价有其十分沉重的分量。

面对这样的成就和代价相互纠缠的生活，政治精英固然没有理由失去探索前行的勇气，而文学世界则不应缺乏悲剧感。

我对这种悲剧感的感应，来自我一度作为移民的经历与见闻。我所说的正是“移民”这个词的最通常用法：国际移民。我看见了，我的万千同胞如何在富裕的西方社会里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化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文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能够除外。

但是，当我回过头来观察我原初家国的这“一城一地”之时，我必须自问：当我知道那些离乡背井的外来工有时候的确会陷入到“或者因抢劫银行而侥幸或者倒毙于路边”的严酷选择，当我看见一车又一车断手伤脚的工伤者不断被停放在我住处附近的医院门廊、呻吟于血泊之中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断定，他们一定比躲在三藩市或者墨尔本的血汗工厂里生产成衣或者躲在地下餐馆里洗碗的华人移民活得更好和更有尊严？

关于华人移民生存境况的一个习惯说法是“二等公民”。这是一个包含了深长感喟的描述，在通俗的表达领域，至今还没有更好的描述可以取代它。我认为，一种人在某个社会里的境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原初联系”的背景社会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权力关系，被复制到一个新社会内部的结果。比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的处境，其实就是他们的第三世界故乡的国际处境（受制于西方世界）投影在他的抵达国社会内部的一个微缩结构。

正是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海外华人通常比中国境内的居民更加强烈地感到他们所背负的中国身影的分量，因为他们的生存已经不由自主地被镶嵌在一个国际权力结构之内，并成为这种结构的标记。